

91896年計劃能於四年中獲得巨大的成功，也未始不是由於利用外國資本與技術之故。其次的一個先決條件是中國內部之政治經濟社會制度的改進，例如整飭吏治，改革財政，安定社會秩序，勵行法治精神，否則要想在社會不寧內政腐敗的環境中而安心實行技術合作，誰也知道是不可能的。

至於這次合作之是否純為技術而無政治的性質，我以為並不是一個重要的問題，因為假如不能實行第一條件時，即使純為技術性質的，也有危險。我們知道東印度公司最初經營印度時，也完全是技術的商業的，但結果是怎樣呢？又在以前帝國主義者對華提出締結不平等條約時，都有關於聘請該國之政治經濟軍事交通顧問的要求，這也是技術合作的一種辦法，但中國政府與人民為什麼要予以拒絕呢？

正因為這大規模的技術合作，於中國於世界有極大的關係，所以纔引起日本帝國主義者的強硬反對。蓋日本現已退出國聯，對於這大規模的技術合作竟未能參加，這對於她的侵佔中國市場與吞併中國土地的野心是一個重大的打擊，我們單獨大部的人民雖可因國聯之技術合作，將來得免受日本帝國主義者的蹂躪奴使，但也希望不要因此而成爲一個國際的公民（良輔）

日本生產黨陰謀的暴露

前月中旬，日本生產黨的大恐怖計劃，忽被暴露，日本人心一時發生劇烈的動搖。據東京報載稱：日本生產黨與愛國勤勞黨取連絡，密謀暗殺齋藤首相，山本內相及高橋藏相，同時暗殺若槻民政黨總裁，鈴木政友會總裁，與牧野內大臣等，並以別動隊襲擊各財閥銀行。此陰謀事件破獲後，經濟界商界以爲軍部因對外軍事已結束，遂向內爭奪政權，一時頓形恐怖狀態。陸海軍當局即時發出聲明，否認謠言，山本內相亦極力否認未有大陰謀，事態的嚴重，可以想見。

此事件我們若從各方面加以觀察，其發生實有甚深的意義。第一，大日本生產黨是現在日本法西斯蒂陣營中的主軍，以頭山滿爲顧問，內田良平爲總裁，前年六月，生產黨先吸收大阪的小商人，小市民及國粹等團體，次乃移本部於東京，同時聯合地方政黨及知識分子，集合全國代議員千名於赤阪三會堂，開第一次全國大會。其主張爲「大日本主義」，其政治綱領，對內則絕對排除寄生金融財閥下的政友民政兩黨，對外主張強硬外交，滿蒙權益國民化，充實精銳的國防。所以若從生產黨本身的組織與主張來看，此次事件的發動，並非是偶然的。

第二，此次事件發生於陸海軍部審判血盟團刺殺犬養首相，即所謂五·一五案之前，亦是值得注意的。關於五·一五案，神武會會長大川周明實爲主要謀士之一，自大川被捕後，此派的活動，便陷於困難。神武會本來是日本法西斯蒂運動的中心勢力，抱着絕大的野心。去年二月他們利用總選舉的時機，宣告成立以後，其目標在改革內政，打破財

閱，排擊既成政黨，其指導精神即同為根據生產黨的所謂「大日本主義」。所以生產黨此次陰謀計劃，實不外欲重演五·一五事件，在陸海軍部審判五·一五案的前夕，來一個恐怖的行動。

第三，日本共產黨領袖的最近所謂「轉向」，也不無給與此次生產黨陰謀事件以若干的影響。共產黨領袖的轉向，佐野學、鍋山貞親開其端，繼之者有三田村四郎、高橋貞樹、中尾勝男，而河上肇之自訴「沒落」的獄中獨語，尤激起一般社會劇烈的衝動。這無怪軍部某要人曾忻然

白海與波羅的海間大運河完成

白海與波羅的海間之大運河現已建築完成。此運河之建築乃由社會低層分子所完成。彼等為割時代大水道建築者之觀念所鼓舞，傾其身心以從事該項工作。彼等在國家政治局監督之下，羣赴蘇聯北部。於此千萬犯罪羣中有盜賊、烟犯、偵探、被放逐之富農、工業建設之破壞者及反革命教授等。此輩社會之泡沫在九月之服務中以其英勇之工作而遇赦者數千人。同時已赦免之罪犯鮮有中途離去者，彼等仍願參加工作，始終共事。彼等工作時乃完全自由，並無警衛監視。此種自由使彼等成為有用之公民。最後大部分罪犯已經改造。例如凡伊達氏原為罪犯，後被任為工程師，卒以其服務優良，得免於罪，被會告莫斯科日報記者，謂渠等絕不畏懼此種艱辛之工作，渠等已成為以打破一切已成紀錄而震驚世界之優秀工人矣。另有工程師名阿那衣夫者，年六十矣。曾以破壞工作獲罪，今已釋放。渠謂：「余今日為一新人矣。予意感化人民當以勞動為最優」云。

地說：「在以皇道主義為根底的日本，抱共產主義者的轉向，這有什麼不可思議的地方呢？」共產黨領袖的轉向，本來轉到那裏去，尚未可知。但法西斯蒂主義者未必不思乘此時機更進一步吸收一般社會到他們的路上去，於是生產黨來放一個號砲。

生產黨的陰謀事件，此次總算先事破獲，未及爆發。但自滿洲事變以來，日本法西斯蒂運動即同時勃興，近因滿洲方面的全盤勝利，勢更緊張，此後未爆發的地雷，恐不能說就此已經清除了罷。（作舟）